

时,被义勇队程普等人捉到,用柴刀杀害。县委委员程青山、特委秘书长李新生等人也都在这段时间被害。由于形势日趋紧张,特委和河东县各机关撤进何家坞、莽木坑等深山。

11月下旬,敌军趁红七军团向赣东北苏区转移时,集中兵力分别从清溪、楚岗、英溪、小源、夏田等五处向程家山发起总攻击。独立师、地方游击队及人民群众武装,在特委领导下,展开了保卫根据地的浴血苦战。最后终因敌众我寡,特委机关被迫转移。此后,叛徒叶景云和楚岗义勇队长叶先来带敌军和义勇队包围“红军医院”,打死看守程炳发,放火烧死了30多名未来得及转移的重伤员。在罗坑,他们搜捕到因瘫痪不能随队转移的河东县委书记熊日才。匪徒们遭到熊日才的坚决抵抗,子弹打光后,熊日才壮烈牺牲。同时,反动派组织了最凶恶的“清乡委员会”,实行“五户联保”制,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酷杀害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同时还放火烧屋烧山,大肆抢掠财物,仅60多户的程家山就被杀了50多人,有4户被杀绝;烧房48栋,抢走了15条耕牛,几乎把7个小自然村焚为平地。英溪工农革命团长王龙等9人惨遭杀害。红军战士刘条志被割下耳朵后遭残杀,游击队长胡松被破腹而死,留在鹿角尖“红军医院”坚持斗争、领导护理伤员的院长胡普全被反革命分子金保山捉去,遭到百般殴打,双眼被烟熏瞎,双腿被打折。红军战士王老五一家5口遭敌人杀害。还有不少革命战士和群众,身陷囹圄,惨死狱中。根据地人民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1934年11月底,特委机关被迫向安徽秋浦转移。先由浮梁程家山往安徽秋浦的马坑,继而迁往黎痕,再迁至杨林。由于杨林区委书记蔡虎才叛变投敌,最后于12月初迁至大板。特委机关在这里经过休整后,多次派独立师带领县第八中队至鄱阳、彭泽、湖口、东流等县攻打敌军和土豪据点,以保卫和发展苏区。12月下旬,敌人集中各路兵力共数万之众猛扑大板,将大板层层包围。特委书记柳真吾等率领农民团,凭借有利地形展开保卫战。危急关头,匡龙海率独立师和县第八中队从黄土岭回援大板,虽与柳真吾等汇合,但敌人不断增援,而红军武器弹药、生活给养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充,经过7天7夜艰苦战斗后,突围撤出大板。皖赣特委、彭泽中心县委、秋浦、东流等县委相继遭到破坏。

柳真吾等突围后,于1935年1月转移到都、湖、鄱、彭边境的武山,会合原中心县委书记陈开运以及田英等人。决定在武山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4月,成立都、湖、鄱、彭中心县委和游击大队,坚持游击战争,一直到抗日战争暴发。与此同时,周成龙、王丰庆、匡龙海等率余部辗转于皖赣边的丛山峻岭,几经周折,最后在至德的高山地区(今属东至县)与倪南山、江天辉等人会合。于1935年6月创立了中共江南特委,将皖赣红军独立师余部与活动在皖赣边区的长江游击大队、皖赣游击大队整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先后以高山、鄣公山(属婺源县)为根据地,在皖赣边区开始了新的斗争。

第四节 瑶里改编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转到抗日民族解放战场,面临一个军事战略的转变。在皖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和陈毅的直接指挥下,汇集于皖赣交界的江西浮梁县的瑶里(今景德镇市瑶里乡政府所在地)。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开赴抗日前线。

参加瑶里改编的红军游击队,主要有三部份:一部份是由原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带领的部分独立团战士和由厥怀仰带领活动在安徽省宁国、泾县一带的游击队;另一部份是由中共皖赣特委负责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以及杨汉生带领的原皖赣特委独立营和活动在安徽省祁门、江西省的浮梁、婺源一带的游击队;再一部份是田英等带领,在江西省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活动的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都是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主力红军离开赣东北苏区时和北上途中根据方志敏指示,留在赣东北苏区和皖浙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的部分红军部队。

熊刚带领的红军游击队,是1934年11月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进抵皖南时留下的侦察营,与赣东北省委派往皖南活动的游击大队300人,合编成的皖南独立团,下辖两个营。这个团于1936年4月又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受皖浙赣省委领导,下辖3个营,以原皖南独立团为基础编为第一营和第二营。其中第三营是原赣东北苏区挺进师的一部份和抗日先遣队留下的部队。主要有:①王丰庆带领的部队,是1934年6月根据闽浙赣省委指示到皖赣边区开辟和恢复工作的挺进师的一部份。②李步新带领的部队,是原抗日先遣队19师的一个排和青阳的一个游击队,其中19师的一个排原是团长王岐山带领的主力红军,为掩护主力转移,被敌人截断与部队失去联系,先在青阳县九华山一带与当地的一支游击队在一起活动,后因敌人“清剿”转移到泾县活动时,与在泾县西南一带工作的李步新取得联系,并成为泾(县)旌(德)宁(国)宣(城)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王岐山任队长,李步新(原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为中心县委书记)兼政委。③江天辉带领的部队,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皖南时,江天辉根据方志敏的指示,带领部份部队去联络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失去联系的倪宝树部队,因未联系上而留下打游击的主力军。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带领的这些红军游击队先后于1936年初在鄣公山会合,并根据1936年4月在鄣公山召开的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的第三营。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独立团受到严重损失,团长熊刚被冲散,政委刘毓标身负重伤被俘入狱。到瑶里改编时,仅保存下50多人。

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以及杨汉生带领的独立营、游击队,是中共皖赣特委(书记王丰庆、副书记李步新)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发展地方武装的精神组建的一支部队。这个营于1937年4月由特委书记王丰庆率领和余金德部队会师攻打乐平鸣山后,被国民党一六师和五五师包围,遭到重大损失。王丰庆被俘后在被押往景德镇经浮(梁)、乐(平)、婺(源)根据地途中,乘机逃出,杨汉生等13人带着1挺机枪突围回到祁、浮、婺根据地。独立营保存下来的13人,加上祁(门)、婺(源)、休(宁)中心县委(特委副书记李步新兼县委书记)领导的游击队和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江天辉兼县委书记)领导的游击队。到瑶里改编时,有150余人。

田英带领的游击队,是1935年初挺进师主力部队撤出皖赣苏区转到贵(池)、秋(浦)、东(流)一带后,由田英率领挺进师一部份部队回到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地区打游击的部队,到瑶里改编时,发展到150余人。

1937年9月上旬,由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率领独立营及祁(门)、婺(源)、休(宁)和祁(门)、浮(梁)、婺(源)两个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打下了敌鹅公滩据点,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在此期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入狱的原皖赣

独立团政委刘毓标(1937年3月3日被俘后关在浙江省衢县监牢里)经陈铁军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释放出狱。他带着《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在祁门舍会山找到皖赣特委后,详细报告了他在衢县监牢里从陈铁军那里得知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当时国内形势。因此,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但是,长期栖身深山、与党中央失掉联系的游击队的负责人,对全局情况了解甚少,又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关于国共合作之说仍有不少疑虑。有的甚至认为下山“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认为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决定:一边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探其虚实,并利用和谈的机会,积极联络边区各支游击队;一边想方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于9月底至10月初,在瑶里正式开始谈判。中共代表是江天辉等,国民党地方政府代表是驻浮梁瑶里的别动大队大队长张甫成等。为了便于联系,根据江天辉的提议,国民党地方政府从瑶里的江家下到祁门的舍灰山架通一条电话线,谈判通过双方代表当面协商和电话联系两种形式进行。双方达成如下协议:①国民党政府军停止向游击队进攻,撤退在根据地周围的一切驻军,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红军人员过境通行无阻。②国民党政府解除“移民并村”和经济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③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和与当局的敌对行动,全部给养可以自由购买。

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后,李步新、江天辉到南昌去找项英、陈毅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他们于10月初从瑶里出发,国民党代表张甫成亲自送他们经婺源到衢州坐火车去南昌。李步新、江天辉途经婺源时,刘建绪(国民党四省“剿匪”总指挥)派他的侄子(驻婺源县团长)送去一封信,要李步新、江天辉写信调部队下山改编,并威胁说:“诸君何去何从,自由选择”。刘建绪的侄子也在一旁劝说,均遭到李步新、江天辉的严正驳斥和拒绝,他对刘建绪的侄子说:“边区红军、游击队听党中央的,没有党中央的明确指示,是不会随便下山接受你们改编的,希望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李步新、江天辉到达南昌时,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还想利用陈毅不在南昌的机会欺骗说:项、陈已留言,叫你们写信回去,要部队到景德镇集中改编。李步新、江天辉立即回答:“没有见到陈毅、项英,我们是不会走的”。第三天,陈毅从赣南回来,他俩汇报了皖浙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和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的经过,陈毅听到后高兴地说:“那很好啊,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保存了这么多武装,不简单呀!”,并称赞:“你们的警惕性蛮高嘛!”,“这样做就对了”。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陈毅一一作了解释,要李、江回去告诉边区党组织和全体指战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引起国内各阶级、阶层、党派、政治集团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各政治集团的赞同,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南方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就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并指示他们回去以后,首先在景德镇成立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由李步新任办事处主任。要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坚决贯彻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早日完成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李步新、江天辉在南昌停留了十几天时间。返回时,陈毅考虑到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长期与党中央失掉联系,怕党员和指战员转不过弯来,便决定亲自走一趟。10月底,陈毅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景德镇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后,由地方政府

派员陪同经瑶里上舍灰山,皖赣边游击队也派了邹志诚带领武装到长岭接应。

陈毅到舍灰山后,代表党中央对在艰苦环境里坚持游击战的干部和战士表示亲切慰问,然后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针对部队和部分干部存在的思想问题,讲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也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国共两党在10*年血战后能够一致抗日的原由所在。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要识民族大义,化仇为友,团结内部,共赴国难。陈毅的报告,使广大干部耳目一新,为统一认识和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陈毅走后,皖赣边党组织一面组织边区党和游击队的干部向部队和各阶层的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家庭不和外人欺,合作抗日得胜利”的道理;一面派人联络周围的各支游击队。12月底,当中央派陈时夫、朱辉、李华楷、张振东、刘玉林、袁大鹏等到达边区工作时,联络各地游击队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原分散在宁国、泾县、祁门、浮梁、都昌、湖口、鄱阳、婺源、彭泽一带活动的各支游击队,已陆续向舍会山集中。1938年1月初,李步新、杨汉生去南昌,向中央东南局及项英、陈毅汇报部队集中和各地党组织联系的情况。项英指示,鉴于原皖赣边党组织在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中已失散的实际,为继续联络皖浙赣边区一带尚未联络上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可成立皖浙赣省委。

李步新和杨汉生回来后,立即向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支游击队传达东南局及项英的指示。1月底已集中在舍灰山周围的各支游击队分批下山转到瑶里进行整训。首先到达瑶里的是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及杨汉生所带领的游击队,约150余人,2挺机枪;其次是熊刚率领的游击队50余人,1挺机枪;最后一批到达的是田英等带领的游击队,约150余人。各支游击队共约350多人,于春节前两天全部到达瑶里,当地群众把准备过春节的鞭炮拿出来燃放,欢迎子弟兵进驻瑶里。各支游击队在瑶里集中整编,分4步进行:第一步是统一番号,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熊刚任支队长。第二步是思想整顿,对部队进行“搞好革命团结”、“自觉遵守纪律”等方面的教育。第三步是军事训练,统一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目的动作和要领,实行了早操制度等。第四步是扩编,在瑶里敬义堂设立招兵处,田英等部分领导干部带领几个10余人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分别到镇和祁门、休宁、至德、浮梁的广大农村进行宣传,仅10多天时间,就扩军200多人。整编期间,陈毅由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主任朱辉陪同,于春节后从景德镇到瑶里,看望下山整编的部队。并召开边区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工农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决定,传达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具体指示。同时,宣布成立皖浙赣省委,以李步新为书记,委员有江天辉、陈时夫、朱辉、熊刚等。陈毅还在瑶里程家祠堂群众大会上讲话,和向当地的保长、甲长、地主、资本家和一些有名望的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8年2月底,新组建的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550余人,在瑶里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后,告别父老乡亲,启程开往安徽岩寺,按时到达集结地域,驻扎在岩寺南边的潜口镇。3月中旬,根据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的命令,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正式编入新四军序列,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下辖3个连(即七、八、九连)。原田英带领的部队为七连,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及杨汉生带领的部队为八连,熊刚和厥

怀仰带领的部队为九连。熊刚任营长,张振东任副营长,刘玉林任军事教导员。从此,这支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人民子弟兵,离开皖浙赣边根据地,奔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

第五节 解放景德镇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于4月21日突破长江天险。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在4月27日上午,从安徽至德打电话给国民党江西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浮梁县政府、浮梁县参议会。要求所属机关的大小官员,各安职守,保护好粮食国家财产,维护地方治安,俟人民解放军到达后再行处理。

4月28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人员,沿中山路的四图里、中渡口、斗富弄、南门头、麻石弄、戴家弄、太白园以及后街(今中华路)的周路口、十八桥、东门头等交通要道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主要内容: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②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③没收官僚资本。④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它一切公益事业。⑤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速捕,不加侮辱。⑥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⑦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⑧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布告一贴出,广大群众争先恐后地阅读,很快在人民群众中传开。全市有3000多工人、学生、市民自动组织起来维持秩序。4月28日傍晚,由浮梁县商会发起并召开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座谈会。邀请尚未离镇的县政府代表、县自卫队代表、镇民代表、商界代表、绅士代表以及商会代表等商议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宜。29日上午7时,各界代表到商会集中,分为两组;手拿鞭炮和标语,一组往中渡口迎接;另一组往泗王庙以南各渡口迎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哨部队,身着粗布绿色军装,冒雨分头由三闾庙、中渡口、泗王庙、十八桥、西瓜洲等沿河地点,乘小船或竹排登岸。他们荷枪实弹,向市区内搜索前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宣传队登岸之后,沿中山路的四图里、中渡口、斗富弄、南门头、麻石弄、戴家弄,以及后街的周路口、十八桥、东门头等通衢要道设立宣传站。宣传队有男女队员10余人。宣传形式有秧歌、舞蹈、腰鼓、说唱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宣传站。宣传队向他(她)们高声宣讲当时的形势、任务和人民解放军纪律等。解放军的先遣小分队,则将沿河东岸停泊的各类船只调集到中渡口,只用了20分钟时间,把浮桥搭好。集结在各山头的人民解放军各部,一部分沿景南公路向乐平、万年、东乡挺进;另一部分通过浮桥经市区向德兴、弋阳方向开进。

部队通过市区时,正值雨天,指战员们全身湿透,但没有一个擅离队伍向住户要茶、要水的。宿营时没有占用民房工厂,采买、购物态度和蔼,彬彬有礼,开价照付,二话不说。市民目睹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态度谦逊,原先关门闭市的商店也陆续开门营业。

4月29日,宣告全城解放。